



江苏社会科学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3-8671, CN 32-1312/C

## 《江苏社会科学》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要素融合及其推进路径  
作者： 季中扬，胡锐翔  
DOI： 10.13858/j.cnki.cn32-1312/c.20250120.002  
网络首发日期： 2025-01-20  
引用格式： 季中扬，胡锐翔.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要素融合及其推进路径[J/OL]. 江苏社会科学. <https://doi.org/10.13858/j.cnki.cn32-1312/c.20250120.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 要素融合及其推进路径

季中扬 胡锐翔

**内容提要**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既是“城乡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支点。其核心要素包括科技成果、教育资源、医疗卫生、道德观念、社会风尚以及公共文化六个方面。其中,道德观念、社会风尚、公共文化属于“融合发展”的深层,不仅能根本性地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及其上限,还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和内在关联性。就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各地实践经验来看,必须多方面协同发力才能潜移默化、久久为功地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行稳致远。具体而言,有如下四条有效路径:一是改善城乡交通及数字基础设施,丰富城乡社会互动场景;二是发展乡村文旅产业,培育乡民面向陌生人社会的诚信理念与服务意识;三是深耕内发节事活动,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效能;四是强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社会服务功能,关爱弱势群体。

**关键词** 精神文明建设 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文化

季中扬,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教授  
胡锐翔,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sup>[1]</sup>。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课题,对此,学术界已开展相关研究,探讨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以下视情况简称为“融合发展”)的思想内涵<sup>[2]</sup>、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sup>[3]</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研究”(23ZDA089)的阶段成果。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胡守勇:《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中州学刊》2023年第8期。

[3]张剑宇、廖小琴:《历程·逻辑·趋向: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历时性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主要方向与核心内容<sup>[1]</sup>,以及定位、难点与策略等。关于这一新课题,既有研究成果虽然已经确立了一些重要议题与讨论框架,但讨论的深度、广度与诸多基础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拓展与廓清。一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为何要融合发展,既有研究大多从现实需要角度来理解,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考。二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究竟在哪些方面应该融合发展,即“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有哪些,对此尚未形成共识。如毛磊等认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包括教育资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人才与文化产业<sup>[2]</sup>;张剑宇等则认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主要关涉科学文化、社会心态、思想道德、价值信仰、行为理念等五个方面<sup>[3]</sup>。三是如何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各地有效的实践经验有待深入调查、提炼与总结。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尤为缺乏基于深入田野调研对融合路径展开的研究。本文拟结合政策梳理和田野调研初步探讨这三个基础问题。

## 一、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必要性的理论认识是开展相应实践的根本与前提。目前,学界大多从“融合发展”在国家发展和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出发,梳理其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城乡深层次融合、开辟精神文明建设新境界、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战略任务<sup>[4]</sup>、提高广大农民素质、保障人民团结奋斗<sup>[5]</sup>等方面的赋能程度与必要意义。既有研究虽然揭示了“融合发展”的价值多维性与话语互文性,但大多为罗列式、散点式的,将“城乡融合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割裂化的探讨,这留下两个问题须进一步厘清:一是“融合发展”的必要性根植于哪几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二是这些议题下“融合发展”有何逻辑性的内在机理。从政策逻辑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融合发展”是一条发挥文化领导权的新治理路径,整体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党的中心任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解“融合发展”必要性的根本视域。作为一项“成型”而未“定型”的开放性事业<sup>[6]</sup>,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实践关切,也有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道路特征,更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导源于对这三层意蕴的具象承载与关联呼应之上。

### 1. “融合发展”是“城乡中国”语境下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

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历来是关乎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sup>[7]</sup>这意味着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当今协调城乡关系的基本向度。而城乡融合的根本在于人的融合<sup>[8]</sup>,这是一个面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空间互动及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其中不仅包含物质性要素的融合发展,更强调文化权利、现代意识等精神性要素的融合发展,这就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时代要

[1]季中扬:《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方向与核心内容》,《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2]毛磊、张今誉:《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定位、难点及策略——基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角》,《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3期。

[3]张剑宇、廖小琴:《新时代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学理阐释与路径探赜》,《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4]胡守勇:《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中州学刊》2023年第8期。

[5]马其南、毕嘉芮:《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策略探究》,《农业经济》2023年第12期。

[6]王静:《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及其超越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8]孙九霞:《文旅发展驱动城乡融合的理论效能》,《旅游学刊》2024年第6期。

求。由是观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时代语境下的“空间转向”,追求一种城乡生产空间、社会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耦合发展的治理目标,其根植于我国社会结构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之中。

在“乡土中国”解体早期,由于工农“剪刀差”,要素与资源向城市集中和倾斜,乡村日趋工具化与边缘化,其精神文明必会面临城市中心主义下的“降格”危机<sup>[1]</sup>。而随着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进程走向互动日益密切的“城乡中国”时代<sup>[2]</sup>,乡村经济社会功能将趋于多元化,诸多发展要素也会向乡村回流,进而建构城乡文明互促互补的关系想象,城乡居民的文化实践与思想观念也将由此走向融合发展。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寻找与调适出契合不同阶段国家和人民需求的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模式,极大地纾解了转型期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而“融合发展”的提出正是党和国家历史地、现实地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现状与需求的思想成果。要而言之,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命题以来,我国城乡关系治理模式进入城乡共同富裕、力促乡村振兴的新阶段。随着以“脱贫攻坚”为代表的城乡物质文明融合发展的成效不断提升,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充分与不平衡日益凸显。一方面,城乡居民精神生活仍有不足,城乡文化消费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sup>[3]</sup>,乡村文化的弱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也势在必行。针对均质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不畅、居民“弱参与”等弊病,转向充分尊重人们美好精神生活需求、提供又好又精文化产品的文化供给模式已成为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基本要求,因此,“融合发展”成为破解城乡诸种精神困境、突破文化发展桎梏的当务之急。

## 2. “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既有研究从多元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sup>[4]</sup>、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空间文化正义<sup>[5]</sup>等角度探讨了“融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sup>[6]</sup>,其突破了单维现代化的窠臼,强调统筹兼顾、协同发展,具有渐进式、连动式、规划式、并联式的道路特征<sup>[7]</sup>。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特质和基本主线的具象抓手。中国式现代化既蕴含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条主线<sup>[8]</sup>,也包含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项核心特征<sup>[9]</sup>。显然,这两个高度概括的方面既较为宏观,也相对独立,无法抽象地实现协同发展,须将二者综合进具体实践中才能做到整体推进,而“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使相关内容能够彼此关联、各有侧重的复合性框架。

[1]王忠武:《乡村文明的价值结构与新时代重构——实现乡村振兴的文明复兴之路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2]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3]傅才武、高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4]季中扬:《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方向与核心内容》,《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5]毛磊、张今誉:《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定位、难点及策略——基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角》,《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3期。

[6]《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7]高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一个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8]辛向阳:《社会主义文明强国建设的意蕴与路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首先,由于“人的现代化”最本质的体现正是“精神境界的现代化”<sup>[1]</sup>,故其亦是“融合发展”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相应实践内容的始终。其次,不仅“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融合发展”的应有之义,而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也与“融合发展”息息相关。就前者而言,传承好城乡间共享的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使全体人民树立起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乡村享受康养农业、观光农业等带来的“生态红利”<sup>[2]</sup>,均是关涉“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就后者而论,弘扬“以和为贵”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个体养成和睦待人的个人修养、维系和谐积极的社会心态与城乡关系,进而形成排斥对抗、掠夺和剥削思想的社会氛围<sup>[3]</sup>,正是“融合发展”可着力施为的领域。总体来看,系统性视域下的“融合发展”可理解为:在面向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城乡居民的前提下,以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主线,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的实现,并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现代化实践。

### 3. “融合发展”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支点

整合发展的城乡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最直接的体现<sup>[4]</sup>,是“两个结合”下有机融合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文明形态<sup>[5]</sup>。其聚焦中国现代性矛盾及其发展难题,可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具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重构性和内在超越性<sup>[6]</sup>。人类文明新形态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形态的整体性、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思想<sup>[7]</sup>。因此,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指归,“融合发展”也是实现这一时代使命不可或缺的实践维度。

以“融合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其合题性与内在契合性。一方面,新的文明形态应该内蕴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征,其中连续性、创新性与统一性是其能够厚积薄发、历久弥新并维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条件,乡土文明和乡村文化是新的文明形态应具有活态连续性的明证<sup>[8]</sup>,是持续生成中华文化创新资源的源泉并蕴含“尚和合”“求大同”“家国一体”等促进“统一性”理念的文化基因,因此,赓续乡土文明与乡村文化应属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sup>[9]</sup>,这必然涉及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回应好这一问题的要点不仅在于把握好批判继承的尺度以确保中华传统文明得以活态新生,更在于建立一种整体性、一体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使城乡文化能够共生共荣,避免二者陷入孤立化、割裂化的发展状态。这就需要面向现代文明、根植于中华文明并立足社会主义文明寻求城乡文明的共同价值,培育城乡居民对公德、公平、自由、正义等文明理念的共识,建立彼此能够进行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实现的“为他人的主体性”<sup>[10]</sup>,以及依托于此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1]叶南客:《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2]赵伟、赵楷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3]殷文明:《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和实践意义》,《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4]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逻辑及其超越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5期。

[5]王友建:《共同富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核》,《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6]张茂钰:《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东南学术》2024年第6期。

[7]杨增崇、严雯瀚:《海外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及其评析》,《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5期。

[8]范玉刚:《以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基于乡村文化复兴的视角》,《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9]宇文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10]贺来:《在异质化的现代社会探求“共同生活”的伦理之道》,《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5期。

园,向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文明进步的客观归宿持续迈进<sup>[1]</sup>。而上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诸种理念,正是开展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题中之义,也唯有通过这一途径方能实现。

## 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

所谓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能够实现城乡融合。故而,推进“融合发展”的前提与关键在于找准城乡融合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大领域相关政策设计中的交织点,进而辨识“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并明晰当前建设这一复杂治理体系的重点方面。

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该文件第十二条至十五条以及第二十五条事实上明确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即科技成果、教育资源、医疗卫生与公共文化,并对这些核心要素如何融合发展给出了具体意见<sup>[2]</sup>。这是对2017年中央文明办印发的《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中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诸要素在城乡融合发展进行方向上的聚焦和实化,前三个要素在指导意见中表述为科学素质、教育水平以及健康素质<sup>[3]</sup>。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无疑主要体现在前述要素的诸方面,但精神文明属于观念形态,并不与科技、教育、卫生的发展同步。奥格本发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变迁速度较快,而制度与观念的变化则较慢,他把这种迟延现象称为文化堕距(cultural lag)<sup>[4]</sup>。事实上,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也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建设与较显性的知识性与资源性要素建设之间的文化堕距现象。不仅如此,就治理逻辑而言,精神文明建设更关注国家为民众提供了哪些精神食粮以及作为个体的人在精神层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力求促进人们以文化审美活动为中心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与道德文明水准的不断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9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了“良好社会风尚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sup>[5]</sup>,并强调了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及道德观念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除了前述四项,还应充分考虑道德观念与社会风尚两个方面。

由“文化堕距”观照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六个要素,可以看到其间存在鲜明的层进式结构,在“融合发展”实践中,应分阶段、突出重点地由表层建设向深层建设推进。其中,城乡居民的科学素质、教育水平与健康素质为“融合发展”的表层,其同物质文明的关联更紧密,基本随着科技成果、教育资源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不仅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约束,更被以量化与标准化的形式考察其建设效果,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下限;道德观念、社会风尚、公共文化属于“融合发展”的深层,其不仅能根本性地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状况,制约文明程度的上限,还往往具备一定的独立性。笔者调研发现,在许多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的道德观念、社会风尚乃至社区文化并不落后,在一些传统文化存续良好的地区,其道德水准、社会风尚与文化生活丝毫不逊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三个深层要素间还有着联结互构的交互作用:道德观念既能在人们接受具有相应价值理念的公共文化的过程中得到涵养,也能被人们融入自身参与的公共文化实践之中;社会风尚在由社会中多数个体的道

[1]段妍:《马克思的文明理论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5月6日。

[3]《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4月6日。

[4]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8日。

德观念所构成的同时,也会作为一种“氛围”潜移默化地涵化个体形成道德观念;公共文化则既蕴含社会风尚的独特因子,也能够带动良好社会风尚的传播与实现。

党的十九大以来,城乡之间在科技成果、教育资源、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推进了城乡精神文明表层建设的融合发展,然而深层三要素的推进仍存在难以走深走实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表层三要素建设成果的可持续性及其跃升空间。由此,本文认为,相较于科技、教育、卫生,在当下的“融合发展”实践中,更应重视道德观念、社会风尚与公共文化三个要素。它们分别反映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文明进步状态<sup>[1]</sup>以及文化层面的创新创造活力,关乎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两大板块<sup>[2]</sup>,共同构成“融合发展”不同层面的核心内容(要素结构形态见图1)。

其一,道德观念方面,在城乡居民生产生活

方式、社会文化空间日趋并轨的情境下,推动因循传统熟人社会道德的个体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化解城乡道德隔阂与张力,继而提升社会融合度与文明程度,这是实现城乡“有机团结”的社会心理基础。吉登斯指出,在现代性的“脱域机制”下,人们社会生活空间被不断重构与延展,“象征标志”“专家系统”等超地方性的抽象社会制度已是人们必须接受的生存语境<sup>[3]</sup>,因此,个体突破礼俗社会中仅将信任对象限定在亲友圈内的特殊信任,走向对于全社会公众以及整个社会组织与机制的普遍信任,是降低人际互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要求。事实上,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缺乏普遍信任不仅影响社会文明进程,甚至成为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根源。就此而言,普遍信任可以说是道德建设的第一要务。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须基于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因而,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通过覆盖家庭、学校、村镇、社区、工作单位等全场景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现代道德观念落细落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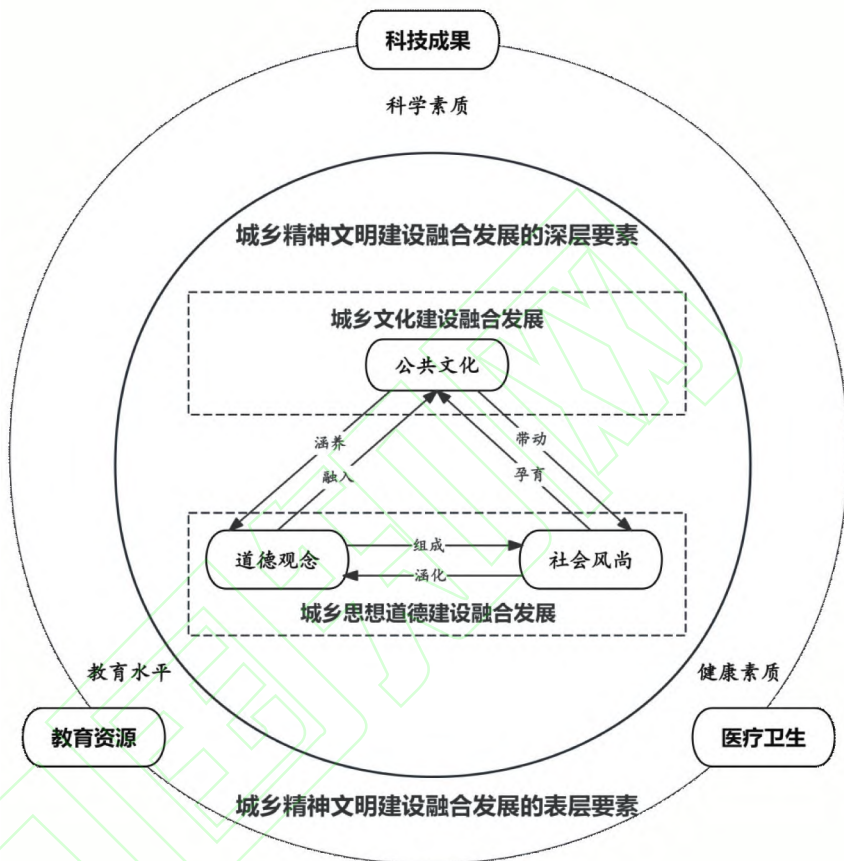


图1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核心要素的结构形态

[1]张靖、王冰冰:《文化志愿服务促进社会文明提升的政策逻辑与能动空间——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图书馆建设》2024年第3期。

[2]温啸宇、林思成、彭超:《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路径探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7页。

入脑入心,是“融合发展”中为普遍信任奠定价值根基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其牢固确立依赖个人诚信品德<sup>[1]</sup>。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诚信品德的养成与整个社会机制密切相关,如农民能否让城里人吃上放心的农产品,其诚信品德就往往来自市场经济规则的约束与培育。对此,将在下文中结合案例具体分析。

其二,社会风尚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表征形态,是一个社会中在特定阶段普遍流行、为社会主体所共同遵循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建构社会风尚的过程就是社会中主导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标准并外显为行为习惯的过程<sup>[2]</sup>。由此可见,在“融合发展”的六个要素中,社会风尚是最“虚”的,但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要素的地位又是毋庸置疑的。恩格斯很早就认识到社会与文明的关系,他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sup>[3]</sup>。埃利亚斯则直接将文明视为一种同人们的日常互动与社会关系网络紧密相连的心理结构<sup>[4]</sup>,人们的相互联系会产生“一种较之单个人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而这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sup>[5]</sup>。从政策话语的关系来看,社会风尚也与“融合发展”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写道:“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sup>[6]</sup>也就是说,热爱劳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内容正是能够超越城乡差异、促使二者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风尚。进而言之,在社会风尚层面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意义还在于,弘扬良好的社会风尚能够促进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对现代文明的认同。应当意识到,城乡居民长期形成的日常生活既有着以重复惯性框定人们思维图式、约束主体创造性的局限性,又有着凝聚社会认同、维系生活意义的正向价值,因而若想实现因俗善治、强化民间生活世界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对之进行扬弃,建构蕴含现代社会风尚的公序良俗。“移风易俗”就是此方面的成功举措,其能够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内容”<sup>[7]</sup>长期发挥作用的要义就在于将科学、法治、平等、开放等现代文明理念带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辨风正俗,形成打击陈规陋俗的外部约束力与弘扬良风美俗的外部推动力,以风尚变迁带动人们素养提升。

其三,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以“公共文化”作为文化的核心要素有其内在逻辑。首先,“文化”与“文明”既相互区别,又互相作用。文明是一元求同的,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是多元存异的,没有高下之别;文明的价值须经由文化形态才能表达,而评判一种文化的先进性亦要以文明的价值作为准绳<sup>[8]</sup>。聚焦“融合发展”方面,笔者曾指出,应以历史文化遗产作为“融合发展”核心内容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唯此才能使乡村避免陷入本地文化失传、外来文化又难以融入的窘境,促进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效融合才是根本之策;二是乡村文化本就是有着独特价值能够同现代城市文化平等交流的

[1]翟学伟认为,“从现实层面来讲,以个人的诚信品德来构成信任网络,是可以实现的”。参见翟学伟:《诚信、信任与信用:概念的澄清与历史的演进》,《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2]张静芳、王蓓蕾:《论核心价值观视域中的社会风尚》,《学海》2015年第6期;揭春兰、韩璞庚:《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哲学阐释》,《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3]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4]蒋萌:《社会型构视角下的文明化进程:埃利亚斯的文明观》,《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5]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70页。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7]曲彦斌:《论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民俗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8]陈炎:《“文明”与“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



主体,两种文化的和谐共生是城乡居民共同感的重要来源<sup>[1]</sup>。上述观点虽然强调了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但秉持的是一种开放性、交互性的视角,有着以现代文明为基准生成新型公共文化的指归。诚然,在保障文明尺度的前提下,应尊重与欣赏不同群体、社区乃至个人所持有的文化的价值,但作为一项强调互动性与共同性的治理方针,“融合发展”更应面向具有全民性、公益性的公共文化展开相应实践,大力推动具有公共性或公共化潜质的文化形态融会创新,树立“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乡村的,也是城市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这一城乡文化建设融合发展宗旨。作为核心要素,公共文化不仅能够使城乡居民在接受公共文化内容和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中培育集体意识与文化认同<sup>[2]</sup>;还可以基于普惠性原则对市场局限性进行纠偏,缩小城乡居民文化能力的级差。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产业也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不仅在资源转化、人才培育、结构调整等方面与公共文化依存共生<sup>[3]</sup>,而且在乡村文旅等业态中,除本身就内蕴着通过生产要素流动强化城乡公众交往、通过生产方式融合发展带动生活方式融合发展的特征,更有着建构公共文化空间的举措以及促进“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等“双效统一”的发展目标<sup>[4]</sup>。

### 三、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推进路径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作为国家政策,不仅是一种价值导向,更是一种社会善治的要求。在了解了“融合发展”所涉及的核心要素及其内涵后,须聚焦实践层面找寻推进路径与长效机制。为此,笔者及课题组其他成员在全国开展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专题调研,希望通过挖掘、分析典型案例,总结具有可操作性且有着推广价值的“融合发展”方案。就当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来看,如下四条推进路径具有良好成效。

其一,改善城乡交通状况及数字基础设施,丰富城乡社会互动场景。周星认为,当代中国最突出和基本的社会事实就是因技术发明、制度创新或商品推出引发的民众日常生活领域持续变迁的“生活革命”<sup>[5]</sup>,以“村村通”、高速公路建设等为代表的交通革命以及手机、网络迅速普及带来的信息通信革命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表征<sup>[6]</sup>。赫尔曼·鲍辛格提出,“技术不仅创造了新的物世界,而且带来了新的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sup>[7]</sup>。在交通与通信革命的共同驱动下,城乡居民生活世界的联结日益紧密、社会互动空前频繁,这是不同思维方式、社会风尚及文化形态交互融合的重要条件。因此,不断改善城乡交通状况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其切实可行的重要路径。

就交通基础设施而言,建设县域覆盖、村村皆通、价格低廉的公共交通体系已成为承载多种社会文化治理功能、塑造城乡居民共同感的重要载体。如安徽省舒城县“一元上车”、特殊群体免费及“村村通”的公交体系不仅联动了多部门资源、开拓了服务到村的物流网络、促进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

[1]季中扬:《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方向与核心内容》,《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2]高丙中:《公共文化的概念及服务体系建设的双元主体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王忠、李小霞:《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共生机理与实践路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4]白凯、资明贵、袁祖社:《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解读》,《旅游学刊》2024年第1期。

[5]周星:《“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6]周星:《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

[7]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更具有畅通城乡精神文化生活的人文内涵。一方面,舒城县依托公交体系打通了多项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将“送戏进万村”等活动平台化,复合性地将企业招工、直播带货、民俗推介、农产品展销、农民自编戏曲展演等要素融入其中<sup>[1]</sup>;另一方面,廉价便捷的公交体系降低了村民进城门槛,可以使之在不脱离长期生活空间的基础上加强入城文化体验与城乡亲友往来,精神生活、与外界联系均得到了丰富。而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经济发展与培育诚信经营意识已成为让乡村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在江苏省沭阳县,完善的花木电商产业链下平均每秒就有19件快递发往世界各地,而支撑这一良好业态的关键因素有二:一是沭阳建设了如扎下镇艺森园等集栽种、制作、展示、工匠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盆景造型基地,并通过集中竞拍的热闹场景吸引周边盆景大户、网红在淘宝、抖音等平台直播带货,协同发展了创意农业与网红经济;二是当地政府为花木快递贴上了“诚信标签”,建立了一套电商追溯机制,顾客如发现不诚信问题可随时扫码投诉并得到及时反馈,强化了农民诚信经营意识、树立了当地售后良好的商业形象<sup>[2]</sup>。

其二,发展乡村文旅产业,培育乡民面向陌生人社会的诚信理念与服务意识。乡村文旅产业作为一种人文经济,不仅要关注产业带来的富民成果,更要通过这一过程中的景观建构、人居环境整治和城乡社会交往等物质关系的实践促进城乡文化间性、社会关系与现代意识的再生产。有研究发现,在从事民宿、餐饮、手工艺、旅游交通等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主客互动下的村民从业者会对社区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审视与反思<sup>[3]</sup>,并在正面旅游影响感知的推动下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sup>[4]</sup>乃至产生自觉的精神追求<sup>[5]</sup>。主客间建立起的积极且可持续的市场规约和主体关系是培育乡民面向陌生人社会的诚信理念与服务意识,提升其道德品质的关键。如江西省婺源县之所以能打造出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品牌,主要得益于其通过定期巡查、先行赔付、统一调度、30天无理由退货等诚信退赔机制在全县建立并维系诚信服务意识<sup>[6]</sup>;再如浙江省松阳县,其“云上平田”等乡村文旅项目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全息自然农法”<sup>[7]</sup>(即不用农药、化肥地生产纯天然农作物),通过实践打造了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彼此充分信赖的、同文旅融合的高附加值订单农业,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主客共在、组织度较高的合作社、行业协会以合理的社会规范和分配制度确保了产品全链条的标准化,强化了生产与经营者的诚信理念与服务意识。笔者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白沙村调研时,村干部深有感触地说,由于发展乡村民宿,不仅乡村公共空间与村民生活空间都整洁卫生了,而且村民不再认为城里人高高在上、不值得诚心对待,逐步确立了服务陌生人的现代意识<sup>[8]</sup>。

其三,深耕内发节事活动,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

[1]访谈对象:安徽省舒城县文明办、文联、文旅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代表;访谈人:季中扬、杨旺生等;访谈地点:舒城县文明办;访谈时间:2024年7月3日。

[2]人民网:《半年1.2亿张“诚信标签”擦亮“花木之乡”招牌》,2024年7月26日,http://js.people.com.cn/n2/2024/0726/c360301-40923720.html。

[3]王帆、梁向明:《乡土文化自觉与内生式社区旅游发展——基于宁夏泾源县冶家村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

[4]陈兴、余正勇:《表征与非表征视角下民宿对乡村空间的叠写与地方再生产——以成都明月村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年第3期。

[5]刘佳、王海凤:《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乡村旅游地居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机制研究》,《旅游科学》2024年5月19日。

[6]访谈对象: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旅局负责人;访谈人:季中扬、张兴宇等;访谈地点:婺源县文明办;访谈时间:2024年5月10日。

[7]李汉勤:《松阳:以“五个百”工程助推乡村振兴》,《政策瞭望》2019年第2期。

[8]访谈对象: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白沙村村委会成员;访谈人:季中扬等;访谈地点:白沙村村委会;访谈时间:2024年1月29日。

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开展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sup>[1]</sup>这一论述为理解“融合发展”背景下如何建构同城市文明“和而不同”的乡村文明形态提供了指导。要言之,乡风文明建设正契合于前文所述“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有着由现代化的多元文化活动呈现文明价值的基本逻辑,更强调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内在驱动力带动乡民的现代转型<sup>[2]</sup>。因此,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应依托鲜活的地方文化、面向乡村整合与村民文化需求创新多种内发文化活动,强化人们的文化自觉和共同体纽带。举办以地域及资源独特性为核心的节事活动(festival & special event,即目的明确、群众参与的大型活动<sup>[3]</sup>),是能够加强地方认同、活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促进本地居民、外来人群在同一时空中深度交往、交流的有效载体。

在当下实践中,以各地“村晚”和贵州“村赛”为代表,越来越多因地制宜却又能城乡共赏的内发节事活动涌现出来,切实推进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就其机理而言,一个优质的内发节事活动往往既能重塑乡村社会文化生态体系,打造独特的文化品牌,吸引外出村民返乡与城市游客来乡,又能够弘扬村民主体性与推进乡村的多元协同治理<sup>[4]</sup>。如贵州省台盘村的“村BA”,成为吸引外出乡村青年回村的重要因素,极大增强了村庄的乡土韧性<sup>[5]</sup>,芦笙演奏、苗族飞歌等别具一格的文化也在“村赛”中得以向全国展演<sup>[6]</sup>,强化了更广域的公共性。再如海南省三亚市梅西村依托春节、元宵节、“建党100周年”等重要节点高频次举办了一系列内发节事活动,不仅丰富了本村居民的文化生活,更作为一种能够让游客深度参与其中的创意旅游形式增强了“候鸟”型游客对本村的地方依恋,形成了跨省域的城乡有机融合<sup>[7]</sup>。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台盘村针对本地兴盛的“球风”,将赛事规则和文明理念整合入村规民约,并以在当地有着较强约束力的“终身不得踏入球场”等独特惩罚措施敦风化俗,不仅减少了当地酗酒、斗殴等不良现象,助推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优化,还有效增强了村庄凝聚力。

其四,强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社会服务功能,关爱弱势群体。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理念暗含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治理愿景,而改善弱势群体生活境遇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sup>[8]</sup>。对弱者的关爱才能体现社会文明的高度,这一群体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状况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映射<sup>[9]</sup>。通常认为,政府是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主导力量<sup>[10]</sup>,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网络为“主导力量”的发挥提供了良好平台。其中,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不同

[1]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2]李容达、李志明:《大众传播媒介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研究》,《理论视野》2022年第12期。

[3]周尚意、吴莉萍、张瑞红:《浅析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以北京前门一大栅栏地区节事活动为例》,《地理研究》2015年第10期。

[4]孙翊铭、牛喜霞:《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的“村晚”:主体、特征及其作用》,《理论学刊》2024年第4期。

[5]王智慧:《错落的喧嚣:“村BA”的社群动员与乡土竞技新秩序》,《社会学评论》2024年第4期。

[6]古晓晴、蔡艺、杨前程:《“村赛”热的冷思考》,《体育学刊》2024年第1期。

[7]访谈对象: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梅西村党总支书记;访谈人:胡锐翔;访谈地点:梅西村村委会;访谈时间:2024年8月12日。

[8]陈伟宏:《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0期。

[9]易艳阳、周沛:《缘情共同体:农村弱势群体支持中的情感逻辑——基于对两个助残扶贫案例的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10]钱再见、高晓霞:《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中政府责任的理论求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于“中心”，其设在街道、社区或镇、村，能够促进社会上下层“精神贯通”<sup>[1]</sup>，因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既要做好理论宣讲工作，更要彰显其社会服务功能，应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与残障群体。

笔者调研发现，基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有两条较为成功的推进路径：一是开展主体多元、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能够打通基层社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当下，大多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都整合了党员、新乡贤、大学生、企业家等多元主体以及文艺活动、养老扶贫、社区交流等多种功能，协同推出了面向弱势群体的大量社会服务项目。如甘肃省永靖县城北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仅有近于免费的老年食堂，还有服务老年人的幸福广场、幸福发廊和乡土艺术馆<sup>[2]</sup>；又如江苏省南京市三友湖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地帮助失能、半失能老人理发与代洗厚重衣物<sup>[3]</sup>。二是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公共空间，助推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入。如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不仅为残障群体提供日间照料、学习培训、康复治疗等服务，还让他们在所内做手工，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让其融入社会、获得价值感。据其负责人介绍，在双凤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就业的残障群体中，有一些是深度抑郁症患者，他们通过参与劳动，居然有效地缓解了病情<sup>[4]</sup>。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生动地诠释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精神内涵。

#### 四、结语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要融合发展、在哪些方面融合发展以及如何融合发展，是阐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必须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对此，本文形成如下三方面的结论：其一，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不仅是“城乡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而且是系统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更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支点。其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表层要素虽然受制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其建设成效可见性较强，而道德观念、社会风尚、公共文化等深层要素培育虽很难入手，成效也难以测量，却是契合精神文明建设逻辑的主要内容。因而，这三个方面才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关键。其三，唯有从多个方面协同发力，才能潜移默化、久久为功地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行稳致远。具体而言，一是应重视城乡交通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既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基础性路径；二是要从培育乡民面向陌生人社会的诚信理念与服务意识等思想道德建设层面理解乡村文旅产业，“发现”文旅产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功效；三是要善用乡村内发的各项节事活动，使之成为链接城乡的重要纽带、在地乡民的精神食粮，使在外乡民和外来游客的乡愁有所附丽；四是在城乡基层中广泛动员多元力量强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既是现代文明所追求的共同价值，更是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性，以真实而广泛的道义力量实现城乡社会善治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玉 水〕

[1]萧放、袁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与基层社会共同体建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2]访谈对象：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城北新村党群服务中心书记；访谈人：季中扬、张兴宇等；访谈地点：城北新村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访谈时间：2024年8月20日。

[3]访谈对象：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三友湖村村委会成员；访谈人：季中扬、张娜等；访谈地点：三友湖村村委会；访谈时间：2024年7月11日。

[4]访谈对象：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凤雅社区李书记；访谈人：季中扬、张兴宇等；访谈地点：双凤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访谈时间：2024年7月4日。